

Khumdan 的對音

高田時雄*

前 言

關於在西方記錄中出現的中國城市名稱「Khumdan」，至今已有多數的學者提出各式各樣的說法。而為何有不同說法的問題點有二，第一是因為「Khumdan」的地理位置所然；第二是「Khumdan」這一詞語相當於什麼樣的漢字？現在以「Khumdan」的對音為題，當然就是針對第二個問題來討論。關於第一個問題：「Khumdan」到底在何處？有說是南京¹的，也有說是于闐²的各種說法並不是沒有出現，但是這全都是誤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¹ 勒諾多 (Eusèbe Renaudot), *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Paris, 1718, p.xxxii. 羅馬的敘利亞人學者阿舍馬尼 (Giuseppe Simone Assemani) 亦採用勒諾多的南京說。參照他的 *Bibliotheca Orientalis*, tome II, (Roma, 1721) ; *Joseph Simonius Assemanus Orientalische Bibliothek, oder, Nachrichten von Syrischen Schriftstellern*, (Erlangen, 1776), S.559.參照伯希和 (Paul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Ed. by Antonino Forte, (Kyoto / Paris), 1996, pp.122-123。

² 楊憲益：《譯餘偶拾》，頁 131 以下〈景教碑上的兩個中國地名〉，2006 年，山東畫報出版社。該文章最初刊行於 1940 年前後。

解，因為早就有公認的說法認為「Khumdan」是指隋唐的首都長安，這是毫無疑問的。故，本篇文章將以此為基礎來進行討論。

出現「Khumdan」的文獻

那麼「Khumdan」及其同一詞源的地名，出現在以下的各種文獻中。首先是早就為人所周知的七世紀前半的拜占庭歷史學家席摩克他（Theophylactus Simocatta），可以在他的文獻中發現「Khumdan」，是亞歷山大所建立的城市名稱之一。那是中國（Taugast）的城市 Χουβδάν（Khubdan），該書同時也提及了兩河流過這個城市的市區³。那是根據到君士坦丁堡來的突厥使者所帶來的情報，被認為是描寫六世紀末的中國情形的。

第二是波斯的尸羅夫（Siraf）人阿布·賽德·哈散（Abū Zayd Hasan）所編輯《中國印度遊記》第二卷（於916年以前成書）裡提及黃巢之亂的一段中，與廣府（Khānfū）一起出現的⁴。阿拉伯語的史料中，其他如：馬斯烏迪（Mas'udi）的《黃

³ Michael and Mary Whitby,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1986), p.192. 希臘語原文見於G.Coedès.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ves à l'Extrême-Orient*, Paris, 1910, p.138以下（特別是p.141）。按照該書的注記，Χουβδάν也有Χουμαδάν的異文。

⁴ 關於這個史料的研究成果相當多，上文所提的勒諾多（Renaudot）是第一個，然後也有M. 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ur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la Chine dans le IXe siècle*, (Paris, 1845) ; G. Ferrand, *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an en Inde et en*

金草原》(943年)、挨德里奚(Edrisi)的《地理書》(1154年)、阿布費達(Abul-Fida)的《人類史綱要》(14世紀前半)等書中都可以見到「Khumdan」⁵。又,古達瑪(Qudāmah)的《稅冊》⁶和馬爾瓦茲(Marvazi)的《動物志》(12世紀初)中也可見到⁷。再來,波斯語的史料中,無名氏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 982年)和葛爾迪齊(Gardizi, 約1050年)等也可發現,在阿拉伯、波斯的文獻中,這個詞語是被廣泛地應用著,且可以作為伊斯蘭文獻的傳統來一起考慮。

Chine, Paris, 1922; J. Sauvaget, *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Inde*, Paris, 1948等。但是, Sauvaget只收第一部,而缺少了第二部。另外,藤本勝次的日譯本《シナ・インド物語》中可得其要領,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76年。

- ⁵ 亨利·裕爾(Henry Yule)《東域記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I, London, 1866) p.li, note 3。考迪挨(Henri Cordier)的增補改訂版(London, 1915),雖然增補了哈德曼(Hartmann)的學說,其他全同。只是,馬斯烏迪的寫本文本(根據 Barbier de Meynard 所刊行的, *Les prairies d'or*, tome 1, Paris, 1861)寫作 Anmū (Anmwā),全部應該改讀為「Khumdan」。參照 V. Minorsky, *Hudūd al-‘Ālam*, 2nd ed., London, 1970, p.224, note 3. Howard S. Levy, *Biography of Huang Ch'a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5),當翻譯馬斯烏迪的相關章節時,保持了「Anmū」的詞語,而在注釋中引用了 Minorsky 的說法。總之,我們可以認為「Anmū」是寫本的誤寫。
- ⁶ 宋峴譯註:《道里邦國志》,中華書局,1991年,頁281。附帶一提張廣達撰寫的本書前言(頁1-22)對阿拉伯的地理學文獻作一概觀,頗有參考價值。另外,古達瑪可認為有相當多依據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卒於912年)所著《道里邦國志》,而現在流傳的《道里邦國志》中不見「Khumdan」。參看次注所引的 Minorsky, 71頁,注3。
- ⁷ 參照 V. Minorsky,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1942。

第三是有名的大秦景教流行碑，其中敘利亞語的部分可見到「Khoumdan」，也同時發現表示洛陽的「Sarag」。關於這個碑文在明末西安西郊的金勝寺被發現以來，在西方至今已有很多研究⁸。而這個石碑是大秦寺的僧侶景淨（Adam）在建中二年（781）所建立的。

然後，第四個是盛唐時僧侶利言（一作禮言）的《梵語雜名》中所見到的，該書中臚列一些地名的地方，「京師」一詞以梵字與漢字音寫為「矩畝娜曩 Kumudana」⁹。利用師覺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的研究，最初注意到這個文獻使用「Khumdan」及「Sarag」的是法國學者伯希和¹⁰。我們根據這一材料能夠瞭解在唐代印度也使用這個詞語。

⁸ 關於景教碑的研究史，上文所述伯希和的書中已有非常詳盡的介紹，在此不多加贅述。

⁹ 這本書在中國早就亡佚，但在日本有傳抄本，也有享保十七年（1817）的刊本。為求方便，現根據《大正藏》第54卷所收的版本，在1236頁中可見到「京師」一詞。《梵語雜名》的異本是寫本《唐梵兩語雙對集》（《大正藏》54，頁1241以下）也流傳下來，其中當然可見到「京師 矩畝娜曩」一詞，只是並未附梵字。再者，編者名中有中天竺摩竭陀國菩提樹下金剛座寺恒多槃多波羅（Tathāgatapāla）及瞿那彌捨娑（Guṇaviśeṣa），卻不見「利言」一名。因此本書應為根據同一原本的別本。享保十七年刊本的編者為「翻經大德兼翰林待詔光定寺歸茲國沙門禮言」，但這一人名必須訂正為見於《貞元錄》及《宋高僧傳》中的「光宅寺沙門利言」。參照無記盒主人（大村西崖）：〈梵語雜名の選者〉，《佛書研究》22，1916年8月，頁4-6。

¹⁰ 正好在1926年師覺明複製《梵語雜名》等梵漢辭書，當做巴黎的學位論文之參考資料，伯希和就有機會見到此資料。P. Ch. Bagchi, *Deux lexiques sanscrit-chinois: Fan yu tsa mig de Li Yen et Fan yu ts'ien tseu*

最後，斯坦因在1907年於敦煌西方的烽燧遺跡中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中看見了「*xwmt'n*」¹¹。將這個文字轉寫的形體改寫為較易讀的形體，即為「*Khumdān*」，也就是我們討論的地名。關於粟特文古信札的時代，至今有幾個說法，現在一般認為是四世紀初所寫成¹²。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成為所有出現「*Khumdan*」的文獻中最古老的記載了¹³。

二、「*Khumdan*」的對音

根據上文可知「*Khumdan*」一詞是由希臘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敘利亞語、梵語、粟特語等西方各民族語言中被廣泛使用的。此詞地理上指稱是中國國都長安是一點都沒錯的，但該詞的原形到底是什麼樣子是個相當大的問題。事實上，關於這一點已有相當多的說法，但說是全部只是沒有根據的推測

wen de Yi-tsing. 2 tomes, (Paris, 1929-37) 即是這本書。參看 P. Pelliot, *L'évêché nestorien de Khumdan et Sarag, T'oung Pao* 25 (1928), pp.91-92. 但是伯希和誤解為出於義淨的《梵語千字文》，可能是師覺明的書收錄《梵語雜名》和《梵語千字文》兩本所致混淆了。

¹¹ 這個詞語是粟特文古信札 (大英圖書館 Or.8212/99.2) 第二號第 15 行及第 18 行中出現的。雖有部分的殘缺，但學者一致認為是「*xwmt'n*」。

¹² 關於其研究史，可參考畢波：〈粟特文古信札漢譯與注釋〉，《文史》2004 年 2 期，頁 73-77 「粟特文古信札研究概述」。

¹³ 2003 年在西安發現的史君墓誌 (六世紀末) 粟特文部分中 (第 15 行) 也出現了「*xwmt'n*」，對於古信札以外的粟特文資料來說是個一個補充，有值得大書特書一番的價值。參照吉田豐：〈西安新出史君墓誌的粟特文部分考釋〉，《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法國漢學》10，2005 年，北京：中華書局，頁 26-41。

而已則也不爲過。然而，爲了回顧過去的研究，根據管見所及，現將這些說法一一列舉¹⁴，以年代先後爲序。首先是十九世紀下半，德國的諾依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關於席摩克他的 Chundan（Khubdan）的發言，他認爲這是「宮殿」的譌音所致¹⁵。大概在同時，法國的鮑梯（G. Pauthier），在景教碑的研究中認爲「Khumdan」是「長安」的敘利亞·回鶻式對音¹⁶。但這些證據薄弱的說法，被後來的裕爾所否定¹⁷。之後，夏德（Friedrich Hirth）提倡「京城」說¹⁸，桑原隲藏則表

¹⁴ 這裡所舉的學說已在岑仲勉：〈外國稱中國的兩個名詞〉，《中外史地攷證》上，2004年，中華書局刊（初版為1962年），頁284-285中有所介紹。又，葛承雍：《唐韻胡音與外來文明》中〈唐長安外來譯名Khumdan之謎〉，一面據岑文重述，一面列舉其後出現的新說法。本文為求正確，逐一記載其出處。2006年，中華書局，頁331。

¹⁵ “Chubdan ist aus Kongtien verdorben, welches soviel als Hof, kaiserlicher Palast bedeutet.” K.F. Neumann, *Die Völker des südlichen Russlands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Leipzig, 1855, S.114, Fußnote 119.

¹⁶ “Cumdan est la transcription syriaque oygour de *Tchang-ngan*, alors la capital de la Chine”. G.Pauthier, *De l'authenticité de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Paris, 1857, p.92.

¹⁷ 注5所引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I, p.li, note 3。又 Josef Marquart, *Osteuropäische und Ostasiatischen Streifzüge*. (Leipzig, 1903), S.89亦贊同裕爾，而駁斥「宮殿」說。

¹⁸ 夏德的說明稍微長了些，在此僅介紹要點。他引用了《兩京新記》和《長安志》的用例，比起諾依曼的「宮殿」說，主張「京城」應該更加妥當，而音韻上不整合的問題，將其視為是經過了突厥語為媒介（Vermittlung）的緣故。F. Hirth, *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in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St-Petersbourg, 1899), S.35-36（腳注1）。

贊同¹⁹。並且，擔當《伊斯蘭百科辭典》的「中國」條目的哈特曼（Martin Hartmann）將「Khumdan」解釋為「汗堂」，也就是汗（皇帝）之堂（宮廷）的意思²⁰。

其他如：佐伯好郎的「關內」說²¹、張星烺的「京都」說²²也陸續出現，但全都不具說服力，同時也沒有贊同者出現。爾後，又有李承祥的「京兆」說²³、岑仲勉的「金殿」說²⁴、龔

¹⁹ 「我在這些學說中認為 Hirth 氏的學說最為妥當。」桑原隲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1926年，京都：弘文堂書房，頁578。

²⁰ “**K**hamdān (= Khan “Emperor” + T’ang “court”?) the capital of the kingdom, Singanfu.” 《伊斯蘭百科辭典》（Encyclopedia of Islam）第1版，第1卷，1913，頁842。

²¹ “We think “Kumdan” is the old pronunciation of Kuan-nei（關內）. We have in Japanese “Kan-dai” for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ith the same meaning. The Japanese received the sound “dai”（內）for the modern Chinese “nei”（內）from the Chinese of the T’ang period twelve hundred years ago. So we may fairly say that our “Kan-dai” is the nearest approach to the old Chinese pronunciation of the modern “Kuan-nei”.” P.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6), p.248. 佐伯後來都固執抱持同樣的說法。P.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2nd ed., 1951), p.109.

²² 「克姆丹即京都二字轉音。指長安京城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3，北京：輔仁大學圖書館，1930年，「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頁135。

²³ 李承祥：〈景教碑之 Kumdan 與 Sarag 音譯商兌〉，《新中華》（復刊）6卷23期（1948）。由於看不到這本雜誌，暫時以葛承雍的記載為準。

²⁴ 「總言之，則六證中曾無一完全中肯之說，其蔽即由於考證家未嘗留心習俗稱謂，與夫中古（及南方）音讀。按『金殿掛帥』、『金殿

方震的「京城」說²⁵、林梅村的「河東」說²⁶也出現，但同樣也是證據薄弱，這些例子大部分都是未針對對音作嚴密說明之故。

從對音的角度來看，眾多學說中最具合理性、說服力的無庸置疑是「咸陽說」。以上所述雖然並未刻意介紹，但筆者認為「咸陽說」是唯一正確的解釋。因此，下面論述關於「咸陽」說的由來，並欲從音韻史的觀點來加以簡單說明。

三、「Khumdan」為咸陽

這個學說最初提倡的是美國的俄裔學者彼得·布伯（Peter Boodberg）。他在 1938 年發表關於北朝史的論文²⁷中，主張席摩克他的「Khubdan」(Khumdan)是咸陽的上古音 *gʷem-dang 的對音。當然他也沒有忘記確認此詞也見於景教碑及阿拉伯史料中。音韻上的對應，和其他的學說相比，妥當性當然是高

論兵』等詞，在舊日吾粵之劇本唱本中，幾於無處無之。『皇帝登金殿』，更婦孺共曉，江總、李白、王昌齡等亦嘗用『金殿』入詩（王詩『奉帚平明金殿開』）。金，粵音 kum（同英文之短 u），殿，《切韻》dien（送氣），合兩音觀之，正與 Kumdan 完全吻合。」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 年，〈外語稱中國的兩個名詞〉，頁 284-285。

²⁵ 「從對音來說，Kumdan 近似『京城』，Kumdan 或為『京城』音譯。」龔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敘利亞文字考釋〉，《中華文史論叢》1983 年 1 輯（總第 25 期），頁 13。

²⁶ 「事實上，'xwmt'n 是『河東』。」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書信的斷代問題〉，《中國史研究》1986 年 1 期，頁 94。

²⁷ Peter Boodberg, *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JAS*, Vol.3, No.3/4 (1938), pp.223-253.

出許多。不過，彼得·布伯自己認為這個學說的弱點在於，如果「Khumdan」是咸陽的對音，則最遲必在漢代（以前）就已借用了，但席摩克他以前的例子尚未證實這一點。但是，現在既然已有四世紀初的粟特文古信札中發現「Khumdan」，這個問題似為不大。

正在十年以後，亨寧（W.B.Henning）在關於粟特文古信札年代的論文中，引用夏倫（Gustav Haloun）的「咸陽」說²⁸。論文中卻未提及彼得·布伯的學說，恐怕是夏倫自己獨立的想法。根據他的研究，咸陽的中古音是 $\gamma em-ĩaŋ$ ，而上古音為 $*g'əm-dīaŋ$ ，那麼就與 $\chi um-dān$ 一致²⁹。關於漢語的 $-ŋ$ [ŋ]，粟特文古信札中也有將敦煌寫為 $\delta rw'n$ ，姑臧（涼州）寫為 $Kc'n$ ，又將金城寫為 $Kmzyn$ 的例子，為此不必特別感到奇怪。在彼得·布伯的說明中，只簡單提到漢語的 $-ng$ 常被外語寫成 $-n$ ，但夏倫指出粟特文古信札中也可見到同樣的例子，這是非常有說服力的。這個「咸陽」說至今在歐美學界也受到廣大的認同，筆者也深表贊同。但是，正如上文所見，仍然出現諸多看法，「咸陽」說在中國尚未受到充分的認知。因此在此稍加若干音韻史的補充說明，以讓這個學說的妥當性更加地完整。

「Khumdan」的對音，如果是由「咸陽」而來的話，這個說明當然就要從秦漢時代的音韻作為立足點。這個時代是屬於漢語史的上古音的範疇，彼得·布伯和夏倫都注意到了這一

²⁸ W.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1948, p.608.

²⁹ 夏倫對應中古音、上古音，使用 Middle Chinese, Ancient Chinese 的詞語。又，其擬構音為特有，現在就如實保持不變。

點。但是，一般的上古音體系主要是以詩經的押韻和諧聲系列作為材料來構成系統，考慮秦漢時代的音韻時，多少應該要考慮到音韻史的流變是必要的。

以下，關於咸陽二字，將以一字一字來說明，而關於「Khumdan」，以年代最古老的古粟特語 *'xwmt'n* 為出發點。「咸」字，在中古音是二等咸韻平聲，聲母是匣母，擬音為 $\gamma\ddot{a}m$ ，上溯上古音是屬於侵部，董同龢擬為 $*\gamma\ddot{a}m$ ³⁰。另一方面，李方桂否認匣母的上古音是摩擦音 $*\gamma-$ ，而改為 $*g-$ ，並主張有 $*g-$ + (一、二、四等韻母) -> 中古匣母 $\gamma-$ ， $*g-$ + j- (三等) > 中古群母 $g + j-$ 這樣的變化³¹。李方桂又假設二等韻的介音為 $-r-$ ，所以其擬音應為 $*gr\ddot{a}m$ 。但在秦漢時期，想必二等韻的介音 $-r-$ 已經全部脫落，而且 $g-$ 也已變成了 $\gamma-$ 。又，這個詞語最初被西方民族所採用的時候，是被粟特人抑或是經由其他語言來傳遞，雖然是在考慮對音時所要正視的重要問題，但不能立即解決的。不過，如果考慮到粟特語文獻出現了如 *'xwmt'n* 的詞語，粟特語既然具有有聲及無聲的軟齶摩擦音 x 和 γ ，然則為何「咸」的有聲音卻寫成無聲音聲母，這就無法解釋了。也許有某一缺乏有聲的軟齶摩擦音的語音介在其中。圓唇母音 $-w-$ ($-u-$ 或是 $-o-$) 也一樣，假設「咸」 $*-\ddot{a}- > -\ddot{a}-$ 的變化的話，稍微無法解釋，但考慮後續唇音 $-m$ 的同化，也就不是不可能了。

³⁰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1944年，頁246。

³¹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8。

接著，第二音節「陽」，「陽」的中古音是三等陽韻平聲，聲母是喻母四等，擬爲 $ji\hat{a}ŋ$ ，上古音屬陽部，韻母部分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聲母部分，從上古到中古之間則有著相當重要的變化，一般認爲喻母四等字，是由上古的 $*d$ -或 $*g$ -變化成 j -³²，而「陽」是屬於從 $*d$ -變化而來的。與「陽」字一樣從「易」的還有「湯」、「盪」、「踢」、「錫」等字，都是透母或定母的舌音字，我們據此容易首肯「陽」字的這一變化。董同龢將「陽」擬爲 $*diang$ 。李方桂以古代台語 (Thai) 以 $*r$ -來表示漢語的「酉」字 (喻母四等)，又如漢代的「烏弋山離」 (Alexandria) 中「弋」 (喻母四等) 的第二音節以 lek 來音譯，因此想像喻母四等實爲和 r 或 l 相近的音，同時也經常以舌尖塞音來諧聲之故，也和 d -是相近的音，這樣一來，李氏暫時將喻母四等表記爲 $*r$ -³³，因此，李方桂擬成 $*rjang$ ，實際上和董同龢的 $*diang$ 差距並不大。秦漢時期的「陽」則還保持著上古 $*d$ -的聽覺印象，相信它應該能夠如實地表現「Khumdan」的對音。彼得·布伯和夏倫都沒有對喻母四等的古音 $*d$ -這個事實表現充分的注意，但要認定「Khumdan」是「咸陽」的對音時，這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證據。介音 $-i$ -被捨去的事實，也與漢語的 $*-ng$ [$ŋ$] 只能寫成 $-n$ 一樣，外國借音中經常可以觀察到，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

³² 最初，高本漢認爲喻母四等的來源改爲 $*z$ -，而董同龢否定了這項說法，在此亦不採用。上揭《上古音韻表稿》，頁 29-30。

³³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13-14。

如以上附加的簡單說明，「Khumdan」的對音以「咸陽」來說明最妥當，其他的說法應該全被否定。

小 結

China 等西方語言中表示中國的詞語是從「秦」的字音來的³⁴，是公認的事實。同樣，秦的國都咸陽的名稱傳至西方，經過時代的演進，仍然作為表示中國國都的名稱，也並非不可思議。這是已經由夏倫所暗示的。但是，最初這個詞語進入西方的時代，當然是秦代。但據目前我們所知，「Khumdan」這個詞語最古老的用例是在四世紀初的粟特文古信札裡。然則「Khumdan」是由粟特人做為媒介所傳播的嗎？夏倫是傾向於這個想法的³⁵。近年來，粟特人的活動可追溯到遠古時代的論調逐漸增強中³⁶，看來這個可能性也不小。但是如上所見，對音上還是有一點無法解決的問題。與中國接壤的地區中並無法否定粟特人的活動，然而在「Khumdan」這一對音詞成立的背景，也無法排除像匈奴那樣的游牧民族、像月氏那樣以綠洲城市為據點的民族，以他們的語言來做為媒介傳遞。

³⁴ 順帶一提，粟特文古信札中也有將中國的名稱寫為 *cynstn* (Čīnastan)，可以解釋為「秦地」。

³⁵ Henning 上揭論文，頁 608。

³⁶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2e éd., (Paris, 2004), pp.24-25.